

2010美國參訪紀行（三）

旅美作家、學者

文·攝影／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繼上期聶華苓、王德威、洪素麗、王鼎鈞的近況報導，此趟美國之行在紐文中心徐水仙主任的熱心安排下，我們也前往拜訪多位文壇前輩：時任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趙俊邁和夫人石語年、作家兼翻譯家林滢的夫人趙蘭芬、作家趙淑俠、夏志清教授及作家叢甦、劉大任等人，帶回他們的近況，與國內讀者分享。

從鼎公府邸離開，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前往位於Flushing的「木蘭餐廳」，展開了另一段拜會之旅。

言笑宴宴，邂逅紐約華文作家協會前輩

在徐主任精心的策劃安排下，席間，我們見到了多位文壇前輩——除了一同前來的鼎公與夫人，還有時任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的趙俊邁先生和夫人石語年女士、作家兼翻譯家林滢先生的夫人趙蘭芬女士、以及作家趙淑俠女士。

趙俊邁學的是新聞，除在《世界日報》從事媒體工作，多年來亦熱心於華文文學的推廣。林滢自1979年從公職退休後便移居美國，不過或許還有讀者記得六〇年代發表於《聯合報》的「林叔叔講故事」等兒童文學系列作品、七〇年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大地之歌》，前者的作者即為林滢，後者的翻譯亦出自其筆下；自1961年開始創作以來，他所累積的文學成果與翻譯作品數量極為可觀，類型遍及兒童文學、遊記、推理小說。只可惜我們到訪時，林先生正輪臥病榻，未能親見，不過很慶幸的是見到了夫人趙蘭芬女士，通過其介紹，我們得知林先生來美後的動向，尤其是他對書法藝術的鑽研，享譽當地華人文化圈。至於趙淑俠，國內讀者

應不陌生，因她的作品一直在台灣出版，特別是長篇小說《賽金花》還曾經改編為連續劇，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趙淑俠在2007年便與同為作家的妹妹趙淑敏一同將兩人的手稿、文學獎章等極具紀念價值的文物捐贈給文學館，故而此次在異地相會，分外感到親切。

雖然不敢自稱我們是來自家鄉的「故知」，不過這確實是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長年旅居海外的文學前輩們的第一次接觸，因此，一方面也許是出於新鮮和好奇，另一方面則當然是因為「君自故鄉來」，在座的文友師長莫不竭盡待客之道，熱切地噓寒問暖、閒話家常。席間，除說明此行目的，也暢談了不少台灣文學的發展現況以及他們在美國為耕耘華文文學所付出的心力。

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是「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簡稱世華作協）的分會，「世華作協」的最初構想來自於長期從事華文教育工作的符兆祥的倡議，希望成立一個世界性的華文文學組織；經當時旅歐的趙淑俠等多人大力襄助，相繼在歐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非洲各地成立了華文作協，加上1981年即已在台北成立的亞洲華文作協，至此，「世界性」的華文組織已然成形，遂於1992年正式



在紐文中心徐主任安排下，見到多位文壇前輩：前排左起趙蘭芬女士、王鼎鈞夫人、王鼎鈞先生、趙淑俠女士；後排左起趙俊邁先生、石語年女士、徐水仙主任、文學館同仁鄭蓮音、洪彩圓、趙慶華。

成立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

世華作協如今在全球各地共有一百多個分會，而無論是哪一個分會，其宗旨皆不外乎集結當地對華文書寫、創作有興趣與熱情的人士參與，以文會友，相互切磋。紐約華文作協由趙俊邁接手後，在例行的會務工作與年度會議之外，更廣邀中港台各地知名華文作家與學者前來演講、座談，舉辦文學沙龍，並與夫人戮力經營「文薈教室」，定期發行由石語年主編的《文薈月刊》，設計各種文藝活動課程。他表示，要在英語世界發展華文文學與文化著實不容易，但隨著近來對華文有興趣的人口越來越多，紐華作協所能發揮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加多元豐富。閒談之間，他對台灣文學館在研究、展示、教育之外的「典藏」功能頗感興趣，尤其在了解了文學館對文學文物的重視以及相關環境設備後，便充滿豪氣地允諾，未來若有適當的機會，應可捐贈一份完整的《文薈月刊》給文學館，透過刊物所載文章，當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並窺得紐約地區的華文書寫樣貌。

說到文學文物的收藏與捐贈，這裡也要對這幾位文壇前輩特別致謝——在行前的聯繫過程中，透過紐文中心徐主任和邱小姐的居中轉達，他／她們

得知文學館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夠收集作家們的文學文物和手稿，因此，長期使用電腦打字寫作的王鼎公和趙淑俠女士還特地挑選了幾樣別具意義的文物交由我們帶回館內典藏；而趙蘭芬女士則帶來了手邊僅存、所剩無多的林滢先生早年創作的文稿，更令我們銘感在心。

績學雅範，博學於聞——夏志清教授90秩慶

午宴在溫馨而愉快的氣氛中結束，緊接著下一個行程是趕赴夏志清教授的生日宴會——臨行出發前，王德威教授便告知，他將於10月23日為夏先生舉辦一場九十大壽的慶祝活動，由於時間剛好湊巧，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很榮幸地在受邀之列，得以恭逢此一盛會。

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的夏志清，原籍江蘇吳縣，1942年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6年隨長兄夏濟安前往北大擔任助教，後取得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完成英國文學博士學位；1961年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30年後自該校退休；2006年以85歲高齡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研院成立以來當選院士時年齡最長者。表面看來，夏志清與台灣的淵源並不深，因為他既未長期生活於此，其研究



夏志清教授（中）90秩慶，紐文中心徐水仙主任（左）代表文建會頒贈「博學於聞」壽匾，右為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

領域又不以「台灣文學」為核心；但實際上，夏志清與台灣的關係可說十分微妙——首先，他的兄長夏濟安於1949年國府遷台時，在香港短暫居留後便轉赴台大外文系任教，並創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學刊物《文學雜誌》（1956—1960），當時人在美國的夏志清也經常為文支援；再者，夏志清在其學術生涯的奠基之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由於重新發現並拔擢當時普遍為中國、台灣文壇所忽略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作家，更於1971年該書的修訂版中以專文討論當時幾乎名不見經傳加以以落魄潦倒的姜貴的兩部作品《旋風》和《重陽》，其論述觀點與文學評價皆在無形之中影響甚至左右了台灣文學的流派傳統與文學史的建構和詮釋。此外，夏志清亦與許多台灣作家交誼深厚，並多次擔任《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文學獎評審；1979年，《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在劉紹銘等人的協助下由台灣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凡此種種，皆使他在七、八〇年代成為台灣文學批評界的權威之一，其文學信念更可說是當時台灣文壇小說界、批評界的主流意見，是後之來者至今仍無法忽略的聲音。

除了治學嚴謹與見解獨到，夏志清最為人所津

樂道的，是他率真爽朗、心直口快，且充滿赤子之情、幽默風趣的一面；在這難得一遇的盛會中，賓客們的致詞以及與夏先生的互動，也證實了這一點。壽宴地點在紐約希爾頓飯店二樓摩根宴會廳，小小的廳室裡，嘉賓雲集，東、西面孔皆有；在眾人的引領期盼中，病體才剛康復的夏先生由夫人王洞女士陪同，笑呵呵地蒞臨了會場，打著鮮紅色領帶，神采奕奕地跟大家擁抱、打招呼，堅持不坐輪椅、不要人攙扶，走到台前，為這場聚會揭開熱鬧而歡快的序幕。

在王德威教授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慶賀活動的第一齣重頭戲是由中研院王汎森副院長頒授中研院院士證章。王副院長表示，夏先生獲選為中研院院士時，由於各種原因沒能回台灣接受這份榮耀，令人十分遺憾（這時夏先生打趣道：「太遠了，我累嘛！」立時引發全場哄堂大笑）；而他這趟不遠千里而來，除了向夏先生祝賀，更重要的就是親自為夏先生配戴這個象徵國家級最高學術成就的徽章。

授章儀式結束後，即由夏先生的老同事、哥倫比亞大學副教務長Paul Anderer首先致詞，他回憶二十多年前自己從一個僻遠的鄉下地方來到哥大，置身於人生地不熟的紐約，首先對他展開溫暖雙

臂、「第一個請我吃晚餐的人」，就是當時已是資深教授的夏志清，這份情誼令他終生難忘。他也對夏先生的文學成就表達了由衷的讚賞：「你（對文學）的分析總是那麼地深入人心、直指生命的內在本質——愛、痛苦與失敗；你的堅持和智慧激勵了我們，因為你是用整個生命擁抱文學……。」對紐約這個城市來說，Paul Anderer認為，夏先生是一件無比珍貴的禮物，「當年，他從遙遠的故國來到異鄉，擁抱一個新的城市，實踐遠大的理想；現在，我們可以說，他不但是一位世界級的學者，也是世界市民。」因此，他向喜歡在紐約街頭漫步的夏先生喊話，希望他能繼續與眾人分享他在紐約的任何時刻、任一生活片段。

數十年來，夏先生在哥大培育了許多傑出的人才，而今，他們多已分散在美國各大學，成為優秀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其中，有「夏門三弟子」之稱的華盛頓大學Robert Hegel、喬治華盛頓大學Jonathan Chaves與康乃爾大學Edward Gunn三位教授當天也都特別齊聚一堂，為夏先生賀壽。接下來上台的，就是「大弟子」Robert Hegel，代表夏門學生講話。作為夏志清六〇年代最早期的學生，Robert Hegel回溯了數十年前的課堂上，他們如何「很困難地」閱讀夏先生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論述，並試圖理解其中義涵；他說，夏先生通常會提供一些見解，不過「他很少談到我們所閱讀的內容，而是要我們在裡面擁抱文學、尋找人性。」細述夏先生所給予的種種啟發後，Robert Hegel以「transmitter」來形容「教育」這個行業，並自陳從夏先生身上所習得的優良

學術傳統將會代代相傳，以此作為對夏先生的致敬。

當一連串稍嫌正式嚴肅的致辭談話結束時，活動已接近尾聲，會場氣氛卻越趨熱烈喧騰起來，大家開始忙不迭地上前贈送各式各樣的禮物、或是爭相與夏先生合影留念。這裡最值得記上一筆的，應是台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高振群處長帶來了馬英九總統致贈的「績學雅範」卷軸，表達他的祝福與問候；徐水仙主任也代表文建會頒贈了「博學於聞」壽匾給夏先生；由於等著跟夏先生致意的人實在太多，我們也只能在倉促之間，匆匆地把從台灣帶來的小禮物和館長的賀卡交到夏先生手裡，未及多言，便先行離開。

左手寫小說、右手寫雜論——叢甦

在紐文中心的辦公室，在剛剛好約定的時間，她來了；衣著鮮艷奪目，聲如洪鐘、爽朗俐落，快人快語，間或夾雜著一串英文，十足的「紐約客」架勢——這是我對叢甦的最初印象。

說起叢甦，許多人最記得的或許是她在《現代文學》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能彰顯現代主義精神的成名之作〈盲獵〉，但這篇帶有卡夫卡存在主義色彩的作品實際上並不是她寫作的起點；真要說起來，她的寫作生涯大概可以從十歲那年投稿《新生報》「兒童園地」一篇題為〈我的小姪女〉的文章開始說起，似懂非懂的年紀，竟然還給自己取了個十分醒目不過許多人不太會唸的筆名「叢甦」，一直沿用至今，問她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她以一貫的簡潔回應：「沒什麼，就是醒過來了嘛！」¹⁷



叢甦（右）近來也開始經營起部落格——在《世界日報》的網站，有一片專屬的小天地，供其直抒胸臆。

歲時參加徵文比賽，得到不錯的成績，才開始比較「正式地」寫作。就讀台大外文系期間，在夏濟安先生的英國小說課堂上，被要求以英國名著《咆哮山莊》為基礎進行創造性的改寫，在精讀文本、細究人物性格和情節後，她完成〈伊莎白拉的蜜月〉一文，深得夏濟安賞識，這篇刊登在《文學雜誌》上的作品，成為她踏入文壇的第一步，此後，便陸續有作品發表於《文學雜誌》。在美國唸書唸得頭昏腦脹之際，接獲《現代文學》的白先勇和《自由中國》文藝欄編輯聶華苓的邀稿，彷彿為她打開了一扇可以好好呼吸的窗，她就這樣一路寫了下來。

從1969年的《白色的網》、1972年《秋霧》，她陸續出版了四、五本小說，但進入八〇年代後，卻轉向各式雜文、散文、遊記的書寫，近來，甚至也開始經營起部落格——在《世界日報》的網站，有一片她專屬的小天地，供其直抒胸臆，且看她近期幾篇文章：〈帝國的負擔——看英國皇家迎親〉、〈本拉登之死〉、〈看艾未未〔被失蹤〕事件〉，都是具有高度現實性與敏感性的話題。原本有些不解，何以作家不再「說故事」而改行「臧否人事」？原來在《君王與跳蚤》一書的序言中，她早已直言：「當被人介紹為『小說家××』時，我

總有些微無奈之感。……自己的偏愛卻是散文，或者，時下一般稱為非抒情或詩情畫意的文章：雜文。」早期小說中澎湃的情感力道和後期雜文理性批判的精神並行不悖，不由得令人聯想到她兼顧個人理想和現實生活的生涯抉擇——為了滿足理想，她先是在華盛頓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為了容易謀生，她又到哥倫比亞大學讀了圖書館碩士。前者讓她可以在文學的世界裡打滾徜徉，後者則提供她奇遇式走進「世界中心」的機會，當上洛克斐勒圖書館主任。

她以一個30歲不到、東方女性的身份，躋身於一個石油鉅子的家族事業，不免要遭受質疑。「這個家族真是不得了，我的老闆是洛克斐勒家族開創者老約翰·洛克菲勒的第三個孫子，他們家的老二尼爾森曾經擔任四任紐約州長以及福特政府的副總統。老五大衛管理銀行，是老洛克菲勒目前唯一還健在的孫子。」當時叢甦工作的圖書館正對著勞倫斯和尼爾森的辦公室，辦公桌背後是一大片落地窗，可以看到洛克斐勒中心的溜冰場和第五大道。很多從台灣來的朋友沒事都喜歡找藉口到她辦公室走走看看，還有人曾經對她說：「世界的中心是紐約，紐約的中心是洛克斐勒中心，而這中心的中心

就是妳所在的圖書館。」

眼中所見是繁華極致的世界中心，但心中所感，則恐怕是另一片風景了。原籍山東的叢甦，1949年隨雙親來到台灣時才十多歲；大學畢業後，負笈美國，屬於標準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留學潮世代。小時候被迫離開原鄉故土的經驗，與長成後帶著半自我流放的心情去國懷鄉的際遇，讓她對「exile」這個詞彙極度敏感。有人把她的創作歸類為「留學生文學」，對此，她並不全然贊同，因為，比起於梨華作品中人物角色始終鎖定在校園裡的留學生，她的作品更關切以各種不同形式流亡、離散、失根、自我放逐者的處境和遭遇。也就是出於這份關切，叢甦在1978年自行申請加入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成為當時筆會裡唯一的華人，被列入「流亡作家」之群，她因而得以結識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東歐和蘇聯的流亡作家，這也促使其能夠更宏觀地審視「流亡」這件事。而她與筆會的因緣並未停留在這裡——八〇年代以降，中國大陸來了另一大批流亡作家，為了把這些隻身飄零海外的作家集合在一起，叢甦找了學者唐德剛一同發起組織「海外華文作家筆會」（Chinese Writers Abroad Center），成為國際筆會的分會。但是筆會規定，「申請成會至少需要20位知名作家」，所以他們又力邀夏志清、白先勇、北島、劉賓雁等名家參與。然而，叢甦最後卻在資格審查會議上缺席了，差點就無法成案討論；幸賴當年「中華民國筆會」的代表余光中「仗義直言」，才獲得大會投票通過成立，而這也成為紐約地區唯

一與國際筆會掛鉤的華文寫作團體。

訪談接近尾聲時，我們聊起她近期的出書計畫——自1987年《生氣吧！中國人》以來，叢甦已有二十多年沒發表新書了。雖然久不寫小說，但十多年來她其實從未停筆，從學術性的論文報告到報刊雜誌的專欄評論文章，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數量，「我現在需要做的是整理那些散稿的工作。」依據她的初步估計，這些年所寫的東西加起來「起碼可以再出十本書吧！」但是，寫作歸寫作，她對自己的文學文物和創作手稿，卻顯得漫不經心，對比於好友陳若曦「很細心，會將會議資料、演講稿、往來書信……做非常詳細的紀錄保存，這點我完全不在行。」其大而化之、不拘小節的個性，充分表露無遺。

傾聽「遠方的風雷」——劉大任

此行的最後一場拜訪，我們遠離市中心，驅車前往紐約郊區，在一處花木扶疏的院落，見到了四十年前的保釣健將，劉大任。

小徑上繁花似錦：不同品種的「楓」、各色芙蓉、杜鵑、繡球、玉簪、勿忘我……，他興致高昂地訴說各色花木的品種、來源、身世、掌故，眾人的讚嘆聲則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之所以如此驚訝，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沒想到，當年那個憤怒激進的紅色青年，不但有蒔花弄草的雅興，更有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綠手指！走到屋後，映入眼簾的是聳然而立的橡樹林、綠草如茵的小坡……；餐桌上，藍染花布桌巾隨風飛揚，主人夫婦備妥餐飲，一場露天

午後盛宴，於焉展開。

話題以「我現在開始用電腦寫作」為起點——1999年自聯合國的工作退休，劉大任從2001年《壹週刊》創刊開始，就為其撰寫專欄，「第一篇〈蒼白女子〉，就是寫張愛玲。」在柏克萊攻讀博士期間，他與張愛玲曾有一段「同事因緣」：當時他們都在「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劉大任做的是類似助教的工作，協助博士候選人閱讀、翻譯中國古籍，而張愛玲則是受陳世驥邀請，到那裡研究中國大陸的政治術語，「她要廣泛閱覽中國大陸的報刊圖書，從裡面找出他們新產生的一些口號、標語，例如像『東風壓倒西風』這樣的話語，找出它的原典、分析其文化、歷史、政治背景等等，一年寫個150頁的paper就可以了。」雖然辦公室就在隔壁，但據劉大任回憶，他與張愛玲同事兩年，大概沒講超過十句話。1971年5月陳世驥心臟病突發過世，一個月後，張愛玲隨即被解聘；劉大任則在此之前便積極投入「保釣運動」，「我的辦公室成了保釣運動的聯絡中心，我太太變成保釣的『革命煮飯婆』」，而他，也從文藝青年成了運動領袖；家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編《戰報》、參與示威遊行、上萬言書……；最後，運動沉寂，博士學位沒拿到，最敬愛的老師離世，他的人生在這裡轉了個大彎。

柏克萊校園向來被視為美國新左派的思想重鎮，而保釣運動也被定位為一場左翼青年運動，然而，劉大任的「左」，卻不是以此始。「我在大學三、四年級，思想上就已經開始朝左走了；參加陳

映真的讀書小組、跟他一起辦《劇場》雜誌，後來就因為我們站在『左』這邊，所以才分裂出來又弄了《文學季刊》。《劇場》百分之九十是翻譯，介紹當時西方最前衛、最先鋒的東西，但《文學季刊》不同，它開始想要反映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和生活的，這裡面已經有『左』的觀念在發酵了。」也因著這樣的「紀錄」，所以他在1966年出國不久，隨即被列入「黑名單」，直到1983年解禁前，有將近十七年的時間無法踏上台灣的土地。

釣運結束後，劉大任進入聯合國工作，1974年第一次有資格放「回籍假」(home leave)，當時可選擇的地點有中、港、台三處，但他既沒有親友在香港、又回不了台灣，懷抱著對紅色大地的憧憬，「去中國大陸看看也好」很自然地成為他的期望，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要尋找失散了十多年的妹妹。「我通過中國外交部請他們幫忙尋找我妹妹，找是找到了，但是情況很慘——她在鄉下當農民，一天在田裡工作十幾個小時，工資五毛錢，兩夫妻一起，一年下來連基本糧食都不夠；他們已經生了四個孩子，肚子裡還有一個，加上公婆，這麼一大家子根本養不起……。」此外，他也在江西老家見到一大批親戚，「他們什麼也沒說，但你只要稍微察言觀色就可以明白一切了。」經歷過十多年左派思想的洗禮，劉大任初次的中國行卻讓他深刻體驗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回來以後，曾經一同參與保釣的朋友從西部搭飛機趕來要聽我『報告』，整個晚上，我就在一些零碎具體的事件裡繞來繞去，一個朋友忍不住了，他說：『你



已經升格當爺爺的劉大任說，從讀書人變成運動者，一輩子受保釣事件影響甚深，人生歷史也因此改寫，但是，「到現在我都沒後悔。」

能不能用一句話總結這次到中國的經驗？」我說：『那裡的人活得不像人。』這簡短深刻卻又殘酷無比的一句話，給劉大任惹來不少麻煩，讓他被戴上「轉向」、「走資」等帽子，幾乎無法在昔日陣營立足；於是，他又走了，到非洲去，待了三年，寫出《浮游群落》。

「參與保釣那段时间寫的文章火氣都大得不得了，邏輯思考完全跟隨著意識形態走，沒有辦法實際地體驗、感受，這樣怎麼寫小說！」不過，在非洲待了一年多之後，他的感覺就不太一樣了——1977年五、六月，張北海、李我焱等友人齊聚在他非洲的家裡，因為過幾年大家遲早要回紐約，於是便開始規劃回去以後準備做些什麼，當時喝了點酒的劉大任發下豪語：「我回去以後要寫十本書。」講完這句話，心靈彷彿得到來自大腦的指

令，文學細胞又一點一滴地活了起來。「我那時候非常想念台灣，特別懷念出國前所結交的藝文界朋友，想把那一段故事寫出來。」由於隸屬於聯合國設置在非洲的「環境規劃組」，因此接觸到很多關於環境、生態方面的術語，「我發現『浮游群落』這個詞很有意思，很適合用來形容台灣漂浮不定的知識分子。」然而，在南緯四度的熱帶草原，放眼望去，是一種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氣象和氛圍，無論是具體的景物細節，還是抽象的情感調性，他都無法進入台灣的脈絡。比方說，「小說的序曲，寫到一個掙脫枷鎖的政治犯逃往中山堂，要爬上廣場前的孫中山銅像，但是我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個銅像究竟是坐著還是站著？」1983年黑名單解禁，他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中山堂去確認——也許有細心的讀者已經發現，小說初版和再版裡的孫先生，呈現兩種不同的姿態。至於在寫作情緒上，他的治療方式是：「從紐約帶來的行李裡，有一張唱片，歌手是胡美紅，我最喜歡她唱的〈港都夜雨〉，就把這首歌從黑膠唱片轉錄在卡式錄音帶裡，一連錄了九十分鐘，重複播放、反覆聆聽，讓我可以『回到』台灣。」也因為如此，他坦承，「這部作品是寫得過於sentimental了一點。」

晚風習習，暮色漸漸降臨，隔著時間之海，回頭探望那個激憤昂揚的時代，已經升格當爺爺的劉大任說，從讀書人變成運動者，他的一輩子受保釣事件影響甚深，人生歷史也因此改寫，但是，「到現在我都沒後悔。」